

---

# 农村养老中正式支持何以连带非正式支持？

## ——基于川北 S 村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证研究<sup>1</sup>

王 辉

**【摘要】**：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虽然在支持的主体、方式和功能上存在不同，但都共同支持着老年人的福利供给。目前学界关于两者的关系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即替代模式、补充模式和平行模式。然而，文章以 S 村为个案，揭示出除此之外的一种新型模式：正式支持的增加会引致非正式支持的增加。社会学层面的连带机制为此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解释视角：连带动力在于互助中心具备了强大的福利吸引力和转化能力，连带路径遵循了正式支持的出现促进了非正式支持的增加，连带范围因为制度化建设而得到扩展。

**【关键词】**：连带模式；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农村养老；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7）12-0068-06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7.12.010

### 一、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也被称为社会照料（Social Care）或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按其提供主体来划分，可以将其划分成正式支持（Formal Support）和非正式支持（Informal Support）。在养老服务领域，正式支持主要体现为政府采取如资金拨款、设施提供，制度建设等与老年福利保障相关的支持。非正式支持是“由亲属、邻居、朋友等构成的初级群体对老年人提供的经济、劳务、精神等方面的支持”<sup>[1]</sup>。建立在关系和情感之上的非正式支持具有满足紧急援救、情感交流和心理安全等方面功能。

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因为各自侧重点不同，各有其作用范围和功能。关于两者间关系，国际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替代（Substitution）模式。Greene<sup>[2]</sup>认为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一种形式的照料资源增多，另一种照料资源将减少。第二种是补充（Complementarity）模式，即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是相互补充的关系。Sundstrom<sup>[3]</sup>认为正式照料是非正式照料的补充，当被照料者的需求超过了非正式照料者的能力时，正式照料就产生了。与此相关的还有分层补充（Hierarchical Compensation）理论，认为老年人照料依照近亲原则排序：配偶、成年子女、远距离的亲属。<sup>[4]</sup>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并行关系，即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互相影响较小，两者共同作用于被照护者。Li<sup>[5]</sup>认为当被照料者接受到正式的家庭照料之后，非正式照料会下降，但是会保持在一个固定点之上。即使正式照料很容易获得，照料者并没有放弃非正式照料。HOWARD<sup>[6]</sup>发现当接受者的需求比较多时，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相互协作方能更好发挥作用，互补性是两种照料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三种模式如表 1 所示。

替代模式强调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提供内容的相似性，通过挤出机制，正式支持的增加会减少非正式支持的数量。补充模式强调两种支持内容的差异性，且缺一不可，非正式支持缺位时，便会拉动正式支持的产生，正式支持的增加不会对非正式

---

<sup>1</sup>本文是重庆市社科规划博士项目“农村组织连带福利比较研究”（2016BS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 辉，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重庆 400044

支持数量产生影响。并行模式认为两种支持提供的内容既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异，其基本假设来自福利多元主义思想，即各种支持方式虽然各有侧重点，但共同发挥作用，互不影响，且正式支持增加不会影响非正式支持数量增减。

表 1 三种模式提供的服务、作用机制及影响

	FS 与 IFS 提供的服务	作用机制	FS 对 IFS 的影响
替代模式	相似	挤出效应	支持总量减少
补充模式	相异	需求拉动	支持总量不变
并行模式	相似或相异	福利多元	支持总量不变

(标注: FS-正式支持, IFS-非正式支持, 支持总量主要指支持数量和类型)

国内学界对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更多是关注各自特征和功能, 并从福利多元视角研究如何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却对两者之间关系研究较少。贺寨平<sup>[7]</sup>通过梳理文献研究了社会支持网的测度, 关系强度, 网络特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姚远<sup>[8]</sup>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论述了非正式支持的理论来源, 功能、运行机制、主要特征和发展前景。李芳<sup>[9]</sup>主要论述了社会支持网对于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构建社会支持网。徐勤<sup>[10]</sup>虽然比较了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不同, 但是没有仔细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内这些研究固然对于把握社会支持的各个侧面具有重要价值, 却不能帮助理解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关系如何这一中心问题。

国外研究所揭示的替代模式, 补充模式和平行模式, 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然而, 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 替代模式、补充模式和平行模式都是面板数据上的静态分析, 未能从实践中洞悉两者间动态关系。其次, 它们均产生西方国家的老年福利实践, 是否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口、福利体制相差甚远的中国, 更具体地讲是否适用于经济较为落后, 人口外流普遍的我国农村呢? 这些未得到学界应有的研究。文章试图以笔者 2014 年 8-9 月在四川省 F 村调研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来对说明二者间的动态关系, 以及以正式支持连带非正式支持的可能性和解决农村养老难题的启示。

## 二、互助式养老中的正式支持

S 村位于四川省阆中市 F 镇, 该镇位于市境西南部, 距市区 13 公里, 面积 29 平方公里, 人口 1.3 万, 共有 6 个行政村。其中 S 村拥有 6 个居民小组, 2005 年经过村庄合并后现有人口 2018 人, 60 岁以上人口为 359 人, 约占总人口的 17.8%, 已较大幅度超过 10% 的老龄化标准。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大约 625 人, 占总人口的 30.1%。S 村虽然地处山区, 但是因为水泥道路贯穿, 交通较为便利。劳动力外流和空巢老人失养的现状, 尤其是老人独自死在家中无人知晓的悲惨事件引起了该镇政府的注意, 他们希望能改善老人的生存状况。除此之外, 闲置的校舍资源和道德责任感的干部也是促使互助养老中心建立的重要原因。蔡莉莉<sup>[11]</sup>认为道德责任是基层官员权力运用的刺激物, 它能提高干部的自我效能感, 进而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养老中心成立之初, 日常开支来自于县民政局和镇政府的财政拨款, 日常管理主要由村镇干部操持。总体上, S 村的互助养老中心运行模式符合 Qingwen Xu<sup>[12]</sup>认为中国农村社区老年福利是通过纵向的财政投入和以半政府的社区机构(村委会)来管理和组织的特征。

(一) 财政资金支持。在政府出资下扩建了可容纳多人就餐的食堂, 改造了墙面、防滑地板, 改建成了 2 间棋牌室、1 个厨房, 安装了水电气和防护栏, 添置了麻将桌、电视机、电脑, 新建了健身设施。虽然没有住宿功能, 但是也能够满足农村老人基本的就餐、娱乐和健身需求。这些改建、扩建、新建成本大约为 36 万元。而每天就餐的人数为 35 人左右。老人们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在互助中心就餐, 每顿饭大约 5 元钱, 老人自己花费 3 元, 政府补贴 2 元。作为在人口外流、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村庄新设立的一个机构, 它在促进老年人的参与能力和建立老年友好型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3]</sup>

政府提供了食堂、棋牌室、电视等与老年人生活相关的硬件设施, 还出资组织老人聚餐, 让老人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在老

---

人生日时，政府对参与聚餐的老人每桌饭菜给予 100 元的补助；对子女未回家过年的老人，互助中心将其安排到中心团年，并给予每桌 200 元的补助。

（二）活动资源链接。在村镇干部的组织下，养老中心每周二下午开展听取法治、养生保健和其他一些生活常识方面的讲座。此外，还有集中学习、读书看报等内容。自老年互助中心自成立以来，村镇干部通过各种渠道聘请了县司法局、乡司法科干部进行了多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普法宣传；从医院聘请专家作关于预防心脏病、心脑血管、老年失明、老年痴呆、艾滋病、老年饮食方面讲座；组织了如何正确使用水电气的安全生活培训。这些活动不仅让老年人学到了知识，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充实了起来。其次，跳健身操和传唱一些经典的革命歌曲能够勾起他们对于年轻时的回忆，进而增加幸福感。在重阳节期间，政府组织专职演出团队到互助中心精心组织一场文娱活动，互助中心老人也极参与节目排演。

（三）组织制度建设。为充分体现老人在互助养老中的主体地位和提高其参与积极性，村镇干部同老人们座谈了 3 天时间，决定只保留 S 村党支部书记作为该中心主任，以处理重要或突发问题。其他干部退出，代之以老人推选出来的副主任负责中心日常事务，并推选了专管环境卫生的卫生部、负责伙食的生活部，以及主导周二下午文娱活动的文娱部。这三个部门，产生了正副部长各 1 名，以具体负责各部工作。此外，在村镇干部的主导下，将入驻中心的老人按照地域范围分成了 6 个小组。组长由老人推选产生，其主要职责是每天通过上门或者电话方式获知老人的信息，并在紧急情况下通知互助中心及其子女。虽然分部和分组制度表面上既不是对老人进行经济支持，也不是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但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体现了政府和村组织为完善老年服务工作的支持，仍然属于正式支持的一部分。

### 三、非正式支持的增加

非正式支持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和趣缘而构建起来的老年支持照料体系，支持主体主要是朋辈群体、家庭和社会慈善，支持内容是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和资金实物。调研发现，在正式支持增加之后，S 村老人的非正式支持也相应增加。

#### （一）朋辈群体支持增加

在正式支持出现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老人之间的关系网变得更加密切，朋辈群体支持正在向“互助”式积极转变。

1. 朋友网络更加密集。在互助养老中心成立之前，老人们的交往一般限制在特定地域和亲属关系范围之内。他们也可能相互串门，或者是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但是因为其形式或时间不固定，所以此种关系网络较为松散，不具有持久性。然而，互助中心通过提供棋牌室，定期开展文娱活动和讲座等平台，增加了老人们之间，尤其是陌生老人之间相互认识和增进友谊的可能性。老人们通过互助中心相互熟悉之后，觉得与自己投缘的，便有了进一步沟通的愿望。一位老人这样介绍：

“在中心我认识了一位和我一样喜欢下象棋的老头，而且和我一样脾气直爽，觉得很合得来，就与他经常交往，有时我们在中心下棋，有时相约一起去赶集，一起耍。今年过生日的时候，他还邀请我去他家吃酒，跟他一起过生日。”（GHK20140903）

互助养老中心这个平台有效地缩短了老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老人们普遍在这里认识了几个较好的朋友，除了像上述所说的相约赶集，互祝生日之外，有的还尝试着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如相互行礼或者是建立干亲家。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交往可能更多限于地缘和血缘范围之内，那么现在的交往逐渐向“趣缘”转变。老人们的交往的地理距离变得更远，交往网络和互动频率较之前更加密集，交往的形式也日渐多元化，且将在场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扩展到场外。

2. 邻里间的生产、生活互助增多。倡导老人之间进行互助养老是政府投资建立该养老中心的最主要初衷之一。如上文所言，通过分组建制的方式将地域范围相近的老人编成一个组。其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组长每天与老人联系，以确保中心能及时知晓留守老人的各种突发情况；二是倡导相邻老人能互帮互助。虽然邻里帮扶是乡土社会的一贯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但

---

是这一传统在分组制度设计和政府树立模范典型的带动下，更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调查显示，邻里间的生产、生活互助增加是分组制度建立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相关事例不胜枚举，如有多位老人有过为其他老人送饭、送菜以及帮助收割玉米、拉水泥、照看小孩和医院陪护等。这些邻里互助虽然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但是较为有效地解决了日常困难，满足了老人们的多方面需求。

## （二）家庭支持增加

1. 子女的情感沟通增多。互助中心配备的电脑网络使老人与子女之间能够通过视频聊天。因为其真实性、及时性和互动性，这种可视画面和语音通话增加了沟通的效果，因此备受老人们欢迎。据记录本显示，该村有 50 多位老人与子女进行过 2 次以上的视频通话。子女作为血亲的延续，也是老人们的牵挂所在。故此，老人们不仅希望自己能够多了解、多关心子女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也希望子女能够与自己多联系，哪怕简单说说话也行，以此来弥补相对寂寞的情感。显然，与子女视频聊天在自己家里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是因为他们不太懂得运用现代科技技术，二是因为 S 村还相对贫苦，普通家庭没有经济实力来购买电脑和安装网络。

2. 子女的经济支持增多。调研发现，相对于前两年，2013~14 年，老人们从外出务工子女那里得到的经济支持增加了。究其原因，笔者与一位在广东务工的农民工进行了视频对话。

“这两年给我老汉（爸爸）寄的钱要多些，主要是因为他们太孤独了，之前嘛，就是偶尔打打电话，现在看到他一年老一年，觉得要好好孝敬他们，多给些钱他让他抽抽烟、买点酒，买点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者和其他老头去逛逛街啊，这些都要钱啊”（CFG20140904）

为了应证这位陈姓农民工言语的真实性，笔者也访谈了他的父亲和其他多位老人，均表示外出务工的子女比之前确实更多地给予经济支持。其中一位老人说：“之前嘛，儿子也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把生活搞好，但就是不提钱的事情，我也不好找他们要。你说没有钱，怎么能够把生活搞的好嘛？现在看到这里耍的老人多了，感觉我们老头之间也有交往，去年除了过生日像往常一样给了 200 块之外，10 月份又给寄了 600 块。”（HTT20140905）

因此，子女给老人们增加经济支持的动因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通过视频聊天实时感受到父母的年龄衰落和日渐落寞的生活状况，从而增加了经济支持，让他们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互助中心让老人们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子女也希望他们之间进行交往，能认识更多的朋友，从而额外提供了老人们的“交际费”或“应酬费”。

## （三）社会支持增多

1. 社会捐赠。养老中心至今接收了两项捐助。第一项是该村一位事业有成的爱心人士每年捐赠 5000 元，用于解决互助中心的水电气等开支。第二项是中心接收了来自某企业捐赠的净水器一台，价值大约 1 万元左右。捐赠的设备在互助中心使用，能够有效提高生活用水质量，从而间接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2. 免费体检。每年 11 月 14 日是世界糖尿病日，阆中市人民医院在互助养老中心给老人们开展免费检测血糖的义诊活动，该村 100 多位老人接受了体检。虽然在当天很多城市市民也能够接受到免费的体检，但是如果没有互助中心这个平台将老人组织起来集中检测，老人们可能也无从知晓该消息，进而不能体验义诊活动带来的福利。

综上，老人之间、子女、社会等以实物、经济或者劳务、体检等多种方式作用于老年人的福利。较之以前，拓宽了老年人的非正式支持网。

#### 四、正式支持连带非正式支持的机理

连带具有多重涵义。在法律层面上，连带意味着权利义务关系的捆绑。在社会学层面上，“连带性吸纳”<sup>[14]</sup>被用来描述浙江农村老年协会在为会员提供老年福利的同时，老年会员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被不同程度地嵌入和吸纳到老年协会之中，从而增强了自主性和权威。“连带式制衡”<sup>[15]</sup>被用来概括在农村正式治理资源短缺情况下，村干部通过利益诱导和情感机制等非正式手段来换取村民的支持，而村民也在特定场合下以谋求自身权益实现来对村干部施加责任。在此治理过程中，干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总体上呈现为一种连带式制衡。“连带性扩散”<sup>[16]</sup>被用来阐述村庄文化治理层面上老年协会如何发挥作用来带动村庄文化的提升。老年协会在嵌入性吸纳与老年人相关的村民来增强自身行动力，进而将协会所内含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传递给更多的村民，使其所倡导的文化规范具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最终成为村落社区内主流的精神文化。

综上所述，连带性吸纳，连带性制衡和连带性扩散等学术概念为本文归纳出连带机制的共同特征提供了借鉴。首先，连带机制的产生与主体的自主性和地位相关，如连带性吸纳需要借助于老年协会自身的福利生产能力，连带性制衡需要依托与村民的情感和利益支持，连带性扩散需要采纳老年协会自身的规则契约意识。其次，连带需要嵌入到农村社会之中，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的礼治、情感、面子、血缘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连带性的传递和扩散起到催化作用。再次，连带机制是从主体传递出来的，但是其影响范围又超出自身界限，如连带性吸纳是将老年人的亲朋好友吸纳进来，连带式制衡是将村干部和村民形成一个共同体，连带性扩散是将契约意识扩散到村庄社区之中。既有关于连带性研究的这三个判断对于文章所着力构建的连带模式做了理论铺垫。

在本研究中，连带指政府和村委会通过老年互助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正式社会支持的同时，老年人的家人、朋友、邻居以及社会慈善力量也被动员起来提供诸如情感、生活和物质上的非正式支持。互助老年中心所产生的连带福利支持致使对老年人支持的场域和空间变得更加广阔，即社会支持的地域范围从互助养老中心扩展到老年人的家中、小组范围内、集市乃至田间地头。连带福利所引起的支持主体也变得更加多元，经从政府和村委会支持的动员，老人之间、邻里之间、子女和社会对老年人的支持也逐渐增多。

（一）连带模式的动力在于互助中心所能产生的福利吸引力和转化能力。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活动资源链接和推动制度建设无疑相当于在小山村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方式让众人感受到养老的重要性。在互助老年中心，无论是给老年人提供棋牌室、视频聊天等硬件设备，还是开展唱革命歌曲、听保健讲座等文娱活动，抑或是政府出资组织聚餐等形式，都较为实际地满足了一部分留守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此，在一个社会福利较为有限的村庄中，它像一个磁场一样吸引着老人的参与。从集体化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村老人喜欢人多热闹的场景，这不仅是因为年轻时的生活习性和心理倾向对于后续的生命历程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还因为在村民自治日渐式微，政治生活严重缺位的农村中，人们很少在凋敝的村庄中产生集体性的愉悦感，进而找不到自身之于外围社会的价值。而互助中心提供的棋牌室、文娱活动、邻里互助等无形中再次凝聚了老人们，促使他们不仅可以打打牌，还可以聊聊家长里短，甚至再次体验到年轻时的集体欢腾，从而提高喜悦感和成就感。通过多次参与此类活动，老人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其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也得到增强。

此外，养老中心因为其资源和权优势，在结构网中处于主导地位，必然会撬动网络中的其它支点，影响其他主体对老年生活的重新注意。老人们不仅自身开始关注养老问题，他们的子女也在互助中心的积极影响下，重新审视代际关系。村庄成功人士或乡贤在此影响下也滋生出孝敬老人的利他心理，使互助中心成为社会捐赠的容器。这些公益慈善要素无论是出于利他主义还是出于广告宣传动机，都以相应的方式嵌入到 S 村老年社会支持网络中。“与个人单独行动相比，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集体资源更能促进个人参与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sup>[17]</sup>故此，以养老中心为中心节点的社会网络一旦形成，便产生了转化能力，来催生和链接新的支持资源。

（二）连带模式的路径遵循了正式支持的出现促进了非正式支持的增加。首先，老人们通过正式支持获得非正式支持中不同内容的传递路径不一样。养老中心作为一个平台，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老年人之间的交流，让参与者认识了更多兴趣相投

的朋友，从而进一步在私下增强互动，较为密集的交往网络让老人们彼此获得支持和帮助。分部/分组制度化直接促进了邻里互助的增加，间接上也促使老人们认识了更多的朋友，进而增加了私底下的交往。然而，老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人情应酬费是子女增加老年人经济支持的重要原因。他们之间的视频聊天，增强了亲情互动，也进一步增加了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因此，子女总体上更加孝敬老人、让老人的内心感到更加满足。同理，社会慈善捐赠是因为互助中心所倡导的养老敬老功能，让社会爱心人士和组织能明确感知到此处是善款或善举的流向地。如图 1 所示。因此，即使连带性动员的过程遵循了不同的路径，但是结果却共同引致了更加密集和富有活力的家庭支持、朋辈群体支持和社会慈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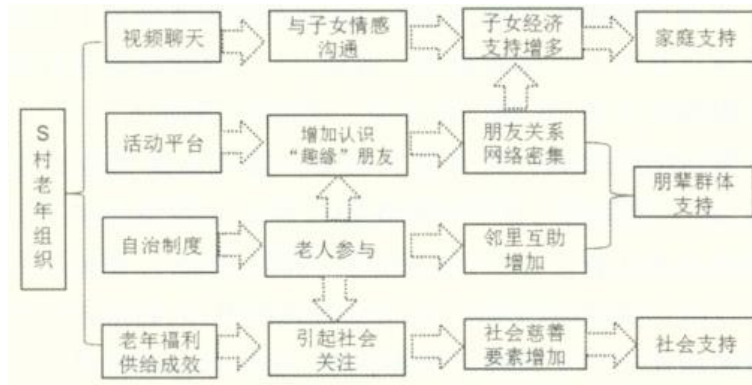


图 1 连带性动员的过程图

其次，在正式支持连带非正式支持中，邻里间生产生活互助增加、子女对老人的情感满足增多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政府和村委会所期待的。然而，老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变得更加密集，子女增加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尤其是人情交往费），以及社会爱心人士和慈善力量对老人的支持增多则是出乎政府之外的，是正式支持所产生的未预期效果。

（三）连带模式的作用范围因为制度化建设而得到增强。制度化是将观念固化到制度到中，让制度来规范和调节行为的过程。互助养老中心的制度化主要体现为分部制度和分组制度。互助中心通过设立生活部、卫生部、文娱部来进行自治。其中生活部负责在每天上午十点之前统计中午就餐人数，并安排午餐的食物品种。卫生部负责每天安排 2 名老人打扫互助中心的环境卫生。文娱部负责每周二下午的文娱活动，并在重阳节、春节等重大节日时编排节目。该项组织结构或分部制度的功能让全体老人都参与到中心的工作和生活中来，进行自我管理。从而不仅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锻炼了他们的参与意识和技能，还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从而在活动中心之外的集市上、家中以及田野上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另外，将地域相近的老人编成一个小组，以倡导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健康老人帮助生病老人，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分组制度，不仅让老人之间的生产生活互助变得简单易行，还能够及时获得老人的信息。追本溯源，互助中心的组织结构和分组制度是政府、村委会与老人们在考虑各方利益基础上进行充分讨论而设立的。从本质上看，它们属于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言为了把握更好获利机会时而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sup>[18]</sup>。故此，它们能够得到老人们的心理认同和积极参与，因为人们更加倾向于遵守自己参与决策的制度，并从中获得较好的福利改进。

这两项制度作为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由老年人自身负责自治的机构，其中既含有政府的适度放权和统筹规划，也凝聚着老人们的建言献策和组织执行，体现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良好融合。这种蕴含了多方参与的制度设置，充当了将正式支持转变为非正式支持的关键环节。以此为中介，不仅正式支持的各种资源能够流向老人，非正式支持也能够得以培育和形成。因此，制度化建设增加了连带模式的作用范围，助推了非正式支持增加的可能性。

## 五、结语与讨论

---

川北 S 村互助式养老个体体系为政府强势嵌入到较为薄弱的老年社会支持网，有效动员了其他支持节点，增加了社会支持；通过设立相关部门，划分小组等制度建设，让老人参与互助中心的管理和各种活动，进而带动其交往并促进了生产生活互助。在连带福利产生过程中，不同的非正式支持内容来源方式和路径选择不相同。正式支持对非正式支持的影响既不是“替代模式”，也不是“补充模式”或“平行模式”，而是“连带模式”，即正式支持的出现连带动员了非正式支持的增加。在连带模式中，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提供服务的内容既可能相似也可能相异。相似表现为老人不仅通过互助中心接受了关怀温暖，也通过老人之间、邻里之间和从子女那里感受到了情感满足。相异表现为正式支持主要体现为政府和村委会的资金投入以及制度设置，非正式支持主要表现为老人社会网络的密集化程度提高，从子女和社会那里受到了更多支持。

尽管 S 村互助养老中心还存在正式支持不足，老年娱乐设施单一，一部分老人因为路途较远致使参与率低等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参与其中的老人满意度较高，觉得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乐趣。文章的政策启示表现为几方面。首先，政府适当的社会福利投入和其他方面支持并不必然产生福利依赖，相反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留守老人的福利需求。其次，政府在人口空巢村创造出具有福利吸引力的社会空间基础上，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能够吸纳老人参与其治理。在此过程中老人的自主性能够得以彰显，进而充当了老年服务的生产者或供给者，而不总是被动等待政府予以支持和救济的服务接受者。最后，政府采取正式社会支持的方式，倡导互助式养老，能够连带性地编织老人之间密集的社会网络、促成邻里生产生活互助，引导外出务工子女和社会对老人增加支持。

然而，个案所展现的是经济落后、人口外流严重，老年人社会支持资源相对缺少的西部农村，而不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农村或福利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福利地区。因此，正式支持动员非正式支持的模式是前述三种模式的补充。本研究局限性在于没有选择多个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对比研究。此外，文章只是选择了 S 村互助养老的良性运行作为成功个案进行研究，还没有对失败的个案进行研究，留待后续探讨。

**[注 释]:**

[1]姚远：《非正式支持与老年人生活质量》，《中国人口报》2006 年 4 月 3 日。

[2]Greene, V.L. “Substitution between Formally and Informally Provided Care for the Impaired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Medical Care*. 1983 (6) : 609-19.

[3]Sundstrom, G., Malmberg, B. and Johansson, L. Balancing Family and State Care: Neither, Either or Both? The Case of Sweden. *Ageing & Society*, 2006 (5) : 767-782.

[4]Cantor, M.H. Family and community: changing roles in an aging society. *The Gerontologist*, 1991 (3) .

[5]Li, L.W.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the amount of informal care among publicly paid home care recipients. *The Gerontologist*, 2005 (4) : 465-473.

[6]Howard Litwin & Claudine Attias-Donfut.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care: a study in France and Israel. *Ageing and Society*, 2009 (1) : 71-91.

[7]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

[8]姚远：《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1 期。

- 
- [9]李芳：《老年人精神需求及其社会支持网的构建》，《学术交流》2012年第8期。
- [10]徐勤：《我国老年人口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人口研究》1995年第5期。
- [11]Lily L.Tasi.Solidary Groups ,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7 (2) : 355-372.
- [12]Qingwen Xu & Julian C.Chow.Exploring the community-based service delivery model: Elderly Care in China.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11 (4) : 374-387.
- [13]Andrew E. Scharlach & Carrie L. Graham.Does the Village Model Help to Foster Age-Friendly Communities?Journal of Aging and Social Policy, 2014 (26) : 181-196.
- [14]邓燕华、阮横俯：《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 [15]陈峰：《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转机制》，《社会》2012年第1期。
- [16]赵晓峰：《通过组织的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协会为考察对象》，《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 [17]Coleman, J.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94, 1994: 95-120 .
- [18]【美】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 R.H. 科斯、阿尔钦、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